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英] 布赖恩·特纳 编
李康 译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第2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英] 布赖恩·特纳 编
李康 译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第2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英)特纳(Turner, B.S)主编;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书名原文: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ISBN 7-208-04669-7

I. B... II. ①特...②李...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692 号

Copyright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2000 editorial int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pyright © Bryan S. Turner 1996, 2000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c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符永卫 张 婷



世纪文景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英]布赖恩·特纳 主编 李 康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co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4.5

字 数 822,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669-7/C·158

定 价 68.00 元

30

德朗蒂 (Gerard Delanty)
利物浦大学的社会学高级讲师
《欧洲社会理论杂志》主编

奥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院社会学教授

柯亨 (Ira J. Cohen)
美国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新不伦瑞克校区研究生院社会学教授

莱赫纳 (Frank J. Lechner)
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埃利奥特 (Anthony Elliott)
西英格兰大学社会学教授

博伊恩 (Roy Boyne)
达勒姆大学社会学教授

普鲁默 (Ken Plummer)
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阿贝尔 (Peler Abell)
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法比昂 (James D. Faubion)
赖斯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维特库斯 (Steven Vaitkus)
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社会理论、社会现象学与东欧研究

洛维尔 (Terry Lovell)
英国沃里克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 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康诺尔 (Steven Connor)
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文学与理论教授, 文化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曼达利奥 (John Mandalios)
格里菲斯大学讲师

厄里 (John Urry)
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斯马特 (Barry Smart)
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特纳 (Bryan S. Yurner)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校区社会学兼历史学教授, 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版序	1
第二版序	20
致 谢	26
 第一编 基础	29
第 1 章 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	31
第 2 章 社会科学的哲学	59
 第二编 行动、行动者、系统	89
第 3 章 关于行动与实践的各种理论	91
第 4 章 系统理论与功能主义	137
第 5 章 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	161
第 6 章 结构主义	192
 第三编 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视角种种	231
第 7 章 20 世纪的符号互动论	233
第 8 章 社会学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	271
第 9 章 人类学与社会理论	298
第 10 章 现象学与社会理论	331
第 11 章 第二波女性主义	364
第 12 章 已转型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396
第 13 章 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	430
 第四编 时间与空间视角种种	471
第 14 章 历史社会学	473
第 15 章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	504



■ 目 录

contents

537	第五编	社会理论的当代发展
539	第 16 章	后现代社会理论
577	第 17 章	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
601	第六编	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
603	第 18 章	社会理论与公共领域
650	附录一	中外人名对照
661	附录二	中外术语对照
682	附录三	外中术语对照
702	译者说明	

第一版序*



布赖恩·S. 特纳

《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旨在为普通读者了解社会理论中的重大发展提供综合全面、紧扣时代的介绍。它是一部独具 20 世纪特色的社会理论导引,注重社会理论最近所面临的种种发展、变迁和论题。因此,它不是经典社会理论的复述,并不打算再来通览一番经典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的那些创始人。诸如此类的复述大多千篇一律,只会事倍功半。当然,也还是有令人信服的观点,要为经典社会理论辩护并作进一步的深入阐发 (Alexander, 1982)。不管怎么说,本《指南》中有学者尝试证明:从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到它的当代论题,其间确实是一脉相承。但这样的证明与陈词滥调地捍卫经典社会理论颇有些不同,而后者正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入门教材的通病。只有第一章是在有意识地概述经典社会理论。如果不对社会理论的历史源起和经典基础有所把握,就很难理解当代的社会理论。德朗蒂撰写的这一章提供了一些新颖的思路来切入这项主题。

在本《指南》中,经典社会理论家还会在许多不同场合出现,在那些地方,他们对社会理论中最具当代特色的发展依然保持着重大的意义。例如,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构筑,韦伯的行动社会学显然就具有直接的关联。与此类似,齐美尔有关文化的种种具体实践和形式的分析,依然深深影响着现代文化研究,实际上还深深影响着后现代文化分析的兴起。博伊恩也注意到了涂尔干对于结构主义社会理论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指南》的重点还是社会思想在当代的发展。

我们选择了“社会理论”这个用语,而不是更专门地指称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或者是政治理论,这也表明了《指南》所涉之广泛。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 (the social) 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因此,《指南》所提供的是对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的一般性引介,涵盖了政治理论、社会学、女性主义和文化分析。每一章都力求概览在 20 世纪主导理论争论的那些主要的论题、视角和主题。

* 在第二版中放在第二版序与致谢之后,中译本调整到前面。经与 1996 年第一版序言对照,已略有修改。——译者注





尽管如此,这部文选的题目本身就表明了一些特定的关怀。显然,《指南》把理论的建构、批判和积累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主要活动。本书中的一些章节,尤其是奥斯怀特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章,点出了理论在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的独特意义。总的来说,自然科学对哲学和理论的成长兴趣相对较小,而在社会学中,理论思辨的地位却始终相当显赫。我们将会看到,对于理论的这种关怀,与作为一项主题出现的社会范畴那人难下定论的性质息息相关。《指南》也关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理论传统的连续性。我稍后还会回过头来谈作为成功理论之具体目标的理论积累的话题,不过在此我要指出,社会理论中的一些视角在维持其分析历经整个 20 世纪的连续性方面是比较失败的。

本《指南》努力探求这些具有重大分析意义的宽泛问题,尽可能避免 $\times \times$ 社会学或 $\times \times$ 社会学之类的文章或争论。《指南》的章节关注的都是宽泛的分析视角与论题,而不是集中于特定领域或主题的社会学。在这一点上,厄里有关时间与空间社会学的分析算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尽管如此,这特别的一章也完全可以称作“社会科学中的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而所谓空间社会学的主题才是一种更精确地界定论题的方式。《指南》提供给读者的,是简要地通览各项主题与论题,而不是一些学科专门领域。

本《指南》试图在所涵盖的论题上做到全面,但它不可避免会有所选择,而且这种取舍也是必要的。例如,我选入了一章通论人类学对社会理论的贡献,因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许多方面转变了我们对于有关意义的分析中一些哲学问题的理解。而出于类似的一系列理由,《指南》之由于篇幅所限而未能收入关于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相互作用的更深层的讨论,也就很让人遗憾了。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业已深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性问题的形塑 (Holton and Turner, 1986)。阿贝尔在其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全面分析中,间接论及了这项主题。《指南》也确实收入了埃利奥特撰写的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章,因为对于女性主义理论、文化分析、政治学研究乃至整体上的社会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如果不纳入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种种发展的分析,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拉康乃至更宽泛意义上的后弗洛伊德理论家,就很难书写 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

最后,我们或许还要指出,本书是一部社会理论指南而非社会理论家指南。大体而言,有关具体的社会理论家的文献难以胜数,而《指南》却力求为社会理论本身提供一种导引。这种面向主题的研究途径,本质上就比只关注特定的人物更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后者往往流于某种形式的社会学圣人列传。无论如何,从社会学的途径来研究知识,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是一种集体性的建构,以回应

在理解社会生活时出现的种种共享的问题和机遇。

1. 社会范畴的性质

在这篇序言里,我大体上关注两个颇为显见的话题,即社会范畴的性质是什么?理论的性质是什么?在本《指南》中,有一项宽泛的主题贯穿始终,所有章节的作者都试图探讨社会范畴的性质,只不过常常以间接的方式。在19世纪的科学争论中,社会范畴常常以与自然或自然范畴(the natural)截然相对的面目出现。社会变迁业已转变了人类所处的自然条件,抑或说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自然的状态与社会的状态殊为不同。在经典社会学中,学者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扩散,社会范畴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或维度逐渐分离。现代工业社会不是一种自然共同体,因为它应对各种需要、满足各种需求的方式是彻底革命的,是独一无二的。而自然共同体则受制于传统,受制于满足需求与需要的传统形式或习俗形式。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时指出,在市民社会中,需求的生产和满足这两个方面,资本主义都创造出了一场革命。从某些方面来看,当代工业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人为创设的经济。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bourgeois society)这一传统的启蒙观念当中,演化出社会维度的观念,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独特、专门的产物。同样,也有一种观念认为,社会学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旨在分析这种新现象,即社会范畴构成的一个自成一体的自主世界。鲁宾逊这个形象让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迷恋不已,因为他正站在土人的自然世界与新型经济之间的道德边界上。

在社会学理论中,这种社会范畴观念表现在滕尼斯的一对著名区分上,即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对照。尼斯比特(Nisbet, 1967)在关于社会学史的一项颇具影响的研究中指出,社会学传统特别关注属于工业现代化产物的一系列对照,也就是一些对立:神圣与凡俗,个人与社会,权威与权力,地位与社会阶级,最突出的便是共同体对社会。关于现代化的社会学描述,诸如帕森斯的模式变量(Robertson and Turner, 1991),都明确采用了这种传统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对照。滕尼斯做出的这种最初的区分,最终发展成一种带着深层的怀旧情结的观点,即随着世俗社会的演进,真实的共同体关系趋于丧失。这种隐含的真诚共同体与人为社会之间的对照,持续影响着大多数社会分析,比如在社会阶级理论的领域(Holton and Turner, 1989)。

作为一块专门分析领域的社会范畴的兴起,始终是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理论之

■ 间一系列内在关系的基本内容。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具有一套比较精确、范围明晰的理论论题和概念,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旨在满足个人需要的理性商品消费这一观念。与此相反,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针对这些经济学根本假设的批判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中的社会范畴概念常常等价于所谓非经济性的观念。也就是说,社会学探讨了价值观念的问题,非理性行动的话题,针对自利驱力的社会秩序问题,以及在一个竞争环境中创设制度的论题。有鉴于此,社会学理论时常特别注重对于宗教的分析和理解,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是极其非理性的。这种针对经济学的社会学观主导了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正是这位社会学家左右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社会学发展的大半面貌。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一书中唯意愿行动的观念,核心便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简单地说,帕森斯认为,功利理性主义的基本假设不能给出一套关于社会的内在一致、让人满意的理论。比如说,欺诈和强力都完全算是理性形式的功利主义经济行为,但也都与社会秩序不相容。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说明社会秩序的时候,总是诉诸帕森斯所谓的“剩余范畴”,它们其实不是来自于理论的核心假设;也与这些假设颇不相容。典型的经济学理论一般会诉诸“历史的幕后之手”或“情感和道德价值观念”之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能从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假设中演绎或生发出来的。帕森斯借霍布斯有关国家的政治学说,把这个论题描述成霍布斯的秩序问题。这种基于对功利主义学说的批判来理解社会秩序的思路,在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当中,已经证明深具影响。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甚至在贬低帕森斯后来的作品的同时,也普遍接受了他有关价值和规范在指导社会行动方面的重要性的社会学基本假设。帕森斯主张,如果关于社会价值观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他通过社会化和内化的概念,继续发展了这一思路。这些观念最终使帕森斯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来描述社会系统,比如他在《社会系统》中的经典研究 (Parsons, 1951)。阿贝爾在其介绍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章里,以一种发人深思、富于意趣的方式,采纳了这种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他指出,帕森斯早期的作品固然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方面构成了重大批判,但却未能发展出一种基于唯意愿行动理论的替代途径,因为他最终转向了一种通过系统来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他研究社会范畴的途径无法为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解决之道。所谓结构功能主义的种种问题,其中一些已经由博伊恩和莱赫纳在本《指南》中作了分析。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都一直对社会范畴抱有一种坚定的理解,但与此同时,在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普遍出现了有关社会范畴的理解的深刻变化,这其实是反映了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深深的不确定

感。康诺尔指出,在文化研究里,社会范畴而今已完全等同于文化范畴 (the cultural)。比如有一种标准的观点,说经典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分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与此相反,当代社会理论在分析的角度上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突出并优先考虑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文化范畴的这种显要地位,是与像詹明信这样的作者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分不开的。他分析了消费主义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已经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扩张 (Jameson, 1984)。因此,社会理论之所以会高度关注文化范畴,很大程度上也是伴随着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的增长、现代社会中一些重大变迁所产生的效应。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出现了一种社会范畴的美学化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经济,休闲工业的增长,多媒体技术的经济后果以及全球旅游,这些都突出了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

在后现代理论里,布希亚 (Baudrillard, 1983a) 之类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类似主张,已经宣告了随着现代传播体系的增长和扩张,在社会领域中导致符号泛滥,社会范畴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在自身上产生内爆 (implosion),所以社会范畴业已终结。因此,布希亚很是怀疑,那些传统形式的社会理论,是否还有可能用作把握当代符号体系性质的方法或手段。为了表述这种转型,布希亚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变迁。尤其是他把现代世界看作一系列摹拟 (simulations),通过这些摹拟,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某种再现 (representation) 的再现的再现 (Baudrillard, 1983b)。这种再现系统的爆炸意味着,传统的社会范畴观念已经完全不适合再用作理解这场传播革命的概念。尽管布希亚是一位既有意思又有影响的作者,但我们最好记住,他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戏仿和反语,他是有意把这些作为写作技巧来运用的 (Rojek and Turner, 1993)。例如,布希亚意识到世纪末行将到来,自己的作品也反映出一种世纪末的心态,具有某种先知预言的成分。经典社会学本身就是 19 世纪的世纪末情怀塑造出来的,社会范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怀里被发现的;与此相反,布希亚意识到了社会范畴的终结。全球污染、欧洲的种族暴力、全球疫病以及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动荡,这些东西孕育出一种处在世纪末看待社会范畴时深层的悲观情绪。斯马特在介绍后现代理论的一章中,深入探讨了許多这方面的论题。

2. 社会理论的衰落?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与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的,就是一种明确的观念,即将社会范畴视为一块单独而自立的领域,包括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之主题的各种



■ 制度与实践。除了对社会范畴的这种明确观念,对社会理论也有一种同样明确的强纲领。当然,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开展的,社会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搜集那些可以促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善的事实。这种经验社会的传统在北美的环境中尤其突出。然而,也有一种同样明确的观点,认为理论的性质就是一套逻辑演绎的命题体系,可以通过形式化变成内在一致的概念体系。这些形式理论被视为真正的科学说明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亨佩尔等作者也发展出一些形式框架,可以借此把这些命题转换成内在一致的关于社会实在的理论(Hempel, 1959)。这些形式框架常常被看作一种等级秩序,从最高的元理论,到分析框架、形式命题,到所谓的中层理论,最后是经验概括和观察。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这种分析社会学的观点显然是和特纳(Jonathan Turner, 1987)与亚历山大(Alexander, 1982)之类作者分不开的。这种社会理论强纲领的根本假设是: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一般性命题的形式化过程,转到经验研究的操作化步骤。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erton, 1968)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例证,他力图通过形式化,将松散的、很不完善的功能主义概念和命题,转为一套确定的研究方案。在当代社会学里,特纳(Jonathan Turner, 1984)尝试通过形式化,将颇有些缺乏组织的各种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的概念,转为一套系统有序的理论,这也算是关于理论形塑的强纲领的另一例证。尽管社会理论的强纲领仍有其活力和可取之处,但在主流社会理论中,关于理论本身的地位已经出现了深重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社会理论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吗?

但这种看法并不应该使我们忽视一桩事实:关于理论究竟是什么或者包含什么,长久以来一直争执不休。奥斯怀特在其介绍社会科学哲学的一章中指出,在社会理论中,有一种传统是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按照这种传统的理解,社会理论基本上就是就经验中的种种难题、实践和制度所做出的说明。社会理论是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发展起来的,旨在通过建立模型或因果阐述等方式,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给出逻辑一致并且较为简单的说明。根据波普的哲学(Popper, 1963),需要通过证伪过程来决定是接受理论还是否定理论。科学之所以具有批判性,是因为它的任务不在于证明关于现实世界的种种假设正确,而是证明它们不正确。与此相反,受社会科学的解释学思路影响的那些社会理论家,则认为理论基本上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释,通过恰当的描述来达成理解。通过从社会行动者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来阐明行动的意义,就可以达成理解。而对于某些社会理论家来说,寻求因果的说明和寻求意义的理解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活动,相反却是社会分析的两个互补的方面。体现这种观点的比如说有韦伯的社会科学哲学,他宣称,社会学既要努力获得因果说明,也要努力获得意义解释。这种传统一般被称作解释社会

学 (*verstehende Soziologie* ,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Outhwaite , 1975) 。而朗西曼之类的当代作者,则对这种社会学观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和辩护。

与此相反,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家却已经主张,因果说明和意义解释这两种活动是相互排斥的,至少是迥然有别的。在当代哲学中,温奇在其《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Winch , 1958)里就采取了这种立场。这种主张表现为两种形式。首先,动机与原因相当不同,前者是通过理解行动的意义加以把握的。其次,社会关系就像逻辑关系,是受规则支配的。而可以用来描述和理解行动意义的那些实际方法,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独具的长处,它发展出的那些实地研究方法,其具体目标就是对那些由外观之常常显得怪异的意义做出解释。例如,关于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力求阐明并理解的,就是那些从某种西方的角度看来常常显得非理性或者与理性无关的巫术和宗教的仪轨。人类学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就是揭示出,所谓信仰和仪轨的情境化,一般就是说在一个文化情境当中,来辨识信仰和仪轨的有意义的内容、理性的内容或非理性的内容。埃文斯—普里查德关于阿赞德人巫术信仰的作品,就是从人类学途径研究“原始宗教”的一个经典例证 (Evans-Pritchard , 1937 , 1965) 。

在一些当代社会理论家看来,如果就这样把理论看作对意义的描述,后果便是使社会理论实际上只是描述了行动者对于自身实践的解释。社会理论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以局部性、情境性的方式,来阐述行动和意义对于本地共同体所具有的含义。这样就已经抛弃了所谓理论可以是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这样一种观念。也有些主张与众不同 (Skinner , 1985) : 越是局部的,描述也就越丰富。因此,对于跨越多种文化进行形式理论阐述或普遍概括,人类学研究抱有高度的怀疑,而它的实地研究方法在看待文化实践和社会制度的时候,也含蓄地采取了一种颇具相对主义色彩的研究途径。近些年来,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将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 (Geertz , 1972) 推向了极端化,宣称社会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写作形式,旨在为地方文化和实践书写故事,从而使行动的意义从故事的形式中浮现出来 (Clifford and Marcus , 1986) 。而只要再从这种立场上前进一小步,就等于是说,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虚构写作的形式,以精心构思的散文,通过想像来重构意义。这种所谓理论阐述就是一种写作形式的观点,事实上已经在当代争论中广为流行了。它已经使人们对于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的理论的叙事风格和叙事结构表现出成熟的自觉意识 (Bourdieu , 1990) 。法比昂介绍人类学的一章中探讨了这些论题。

激进人类学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这些发展趋势,表明了对于社会科学整体方案的信心的某种失落,至少是对于理论构筑强纲领的信心的某种失落。许多社会理论家已经采纳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形式,作为发展社会考察的一种技术,或



者已经采纳了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作者的解构技术 (Derrida, 1978)。例如盖姆的《消解社会范畴》(Game, 1991)就是这种社会理论思路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些发展趋势的结果,体现出当代社会理论中一种很有意味的悖谬。社会理论中有两股相互矛盾和对抗的潮流。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所采取的路线我们可称为社会理论的弱范式。而另一方面,则是理性选择理论,这是社会科学中一股深具影响的理论思潮,它坚定地奉行社会理论建构的强纲领。这种分野就引发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关于理论实践中延续与积累的可能性问题。

3. 社会理论中的延续与积累

社会理论中只有很少几股传统能够声称,在整个 20 世纪中保持了显见的延续和成长。很少有证据表明,通过经验上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上的重新阐述这两方面的辩证过程,理论成功地实现了积累。比如说,在马克思主义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其后来的各代继承学说之间,显然有着深刻的分野 (Kolakowski, 1978)。早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革命变迁的经济条件,而后来的各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把注意力转向文化分析,现代社会中上层建筑的角色,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践的哲学问题 (Anderson, 1976)。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组织化的共产主义体制遭遇的危机,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作环境。这些全球性的政治变迁已经对一些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负面效果,比如关于发展与欠发展的社会学,阶级分析的社会学以及国家社会学。

和马克思主义类似,对于女性主义,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浪潮入手,进行历史角度的分析。洛维尔在她为本《指南》撰写的两章中注意到,就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来看,女性主义的立场、取向和分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如此,近些年来,在黑人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中白人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也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区分。在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路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路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的区分,也可能同样显著。人们没有看到理论成功地走向成熟,而是看到了歧异与分裂。

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进一步刻画这种显著的非连续性。人们经常认为,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功能主义是北美的主导理论范式。虽说帕森斯社会学与功能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尚待商榷,但可以肯定,功能主义的主宰地位是与帕森斯的学术生涯密不可分的 (Robertson and Turner, 1991)。功能主义受到过形形色色学派的攻击,比如冲突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和马克思主义 (Alexander, 1987)。可以肯定的是,帕森斯的影响之衰亡,是与功能主义作为一种范式之

衰落相伴随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重新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引发了所谓的新功能主义,不过这个群体尚未提出一套关于社会的一般性理论(Alexander, 1985)。

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各个传统内部,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理论积累,社会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时尚与分裂,而不是连续的成长(B. S. Turner, 1989)。对于这一大体上的观察,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成长也许算是例外。普鲁默和阿贝尔都认为,在这两个领域里有着连贯的研究传统,相对而言没怎么受到重大范式转移或内在分歧和异见的打断。当然,在理性选择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途径,比如交换理论和博弈理论,但这些思路都共同享有理性选择理论的那些基本假设。与此类似,尽管符号互动论有不同的学派,但它们所持有的根本假设却是相同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可能有助于社会理论中的延续与积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成功的学派或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些适宜的制度条件,比如职业社团的发展,一种卓有成效的资助体制的创立,专业杂志的组织以及其他出版渠道。涂尔干学派早年的成功或许是一个经典例证。然而,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主导潮流却表现为分裂与分割,而不是什么成功的积累。因此,我们如何可以说明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中明显可见的延续性?在这两个例子里,有一些论题似乎比较重要。首先,它们都对某一个限于中程层面的经验问题持有一种明确的观点。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关注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就是从最佳利益或自我利益之类概念的角度来看理性行动的性质。这里特意用“简单明确”这种表达,以表明理性选择理论认可通过一系列基本概念来努力达成说明的简单化。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难题,其实就是大多数消费行为的非理性性质。有一系列的尝试要为这些基本的难题和困境提供解决之道,而理性选择理论的延续也就是这些尝试合力完成的。关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理性选择,学者们的阐述是相当理想化的,既简单明了,又富有弹性。它大大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里的配置过程(Margolis, 1982)。符号互动论的根本问题,则在于日常生活当中符号意义的创生与交换。更精确地说,它关注的是为互动这一观念提供一种让人满意的说明,从而就自我的社会性质、社会互动的维持,以及关于越轨行为的种种问题,创造出系列很有意思的概念和思路。

对于如何判定理论的增进,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一套明确的标准。比如说,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力图塑造既简单明了又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两种传统也都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理论中的一项核心理论论题,即微观—宏观关系。最后,还可以注意到,两种理论传统都维系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研究传统。这方面在符号



互动论的例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经芝加哥学派之手,创立了一种关于职业群体和生涯的研究传统。再到后来,符号互动论发展了标签理论污名化(stigmatization)理论以及诸如次生越轨之类的越轨行为模式,并以此对有关越轨和犯罪的社会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美国,马扎(Matza, 1964)和贝克尔(Becker, 1963)通过局外人观念大大推进了有关污名化的分析,通过犯罪倾向的概念大大推进了对越轨生涯的分析。在英国,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约克越轨研讨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刺激了越轨社会学的发展(Cohen, 1971)。学界人物这样汇聚一处,引发出对英国犯罪的一系列重大研究。在英国,约克越轨研讨会显然是在剑桥犯罪学家的思路之外另寻出路,人们认为后者过于紧跟英国内政部对犯罪的看法。这种长期关注社会问题、实践政策以及经验研究的做法,似乎曾经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延续与积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受害者研究,犯罪倾向、标签理论和污名化作为一些研究途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黯然失色了。这种转变反映了英国和美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看待犯罪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不管怎么说,对于一种新犯罪学的追求(Taylor, Walton, and Young, 1973),大大有助于在各种越轨理论之间创造出一致的关注焦点。

4. 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对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批评,就是认为它未能以任何显著或切实的方式,去解决20世纪理论活动中已经成为常年话题的某些根本问题、两分和难题。简言之,在社会理论中很难看出有什么明确的、毫无疑义的进步。不断发现新的话题,也不断弃置旧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为说明与解释之间的两分对立提供某种解决之道时,社会理论确实面临根本上的困难。所谓“理论”究竟指什么,或者理论的进步是由什么来构成,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共识。结果,人们可以把理论看作一种宽泛的框架,用来组织和安排研究;或者看作汇集了一些有助于指导研究关注方向的一般性概念;又或者看作一种特定的取向,将研究者引向那些众人讨论的问题和论题。因此,关于社会理论是什么,或者它可以实现怎样的目标,达成的共识也就比较少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晚近的发展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混乱局面和不确定性。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理论尚未妥善地处理好那些业已构成理论竞争领域特征的经典两分对立,也就是说在行动(action)与实践(praxis)、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微观研究思路与宏观研究思路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两分。尽管柯亨以相当同情的立场介绍了结构化理论,但是否

确如他所言,吉登斯版本的结构化理论解决或超越了关于行动与结构的许多经典问题,对此我表示怀疑 (Smith and Turner, 1986)。而解决微观研究思路与宏观研究思路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更有希望一些。可以肯定,韦伯的行动社会学的宗旨,就是要从对行动、社会行动和互动的基本阐述开始,逐步上升到规模更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理念型就属于这种策略,从有关理性、传统、情感等各种行动形式的微观命题出发,逐步迈向一种宏观社会学。帕森斯的唯意愿行动理论也有类似的目标或目的,从单位行动的概念出发,逐步构筑社会系统理论。普鲁默在其介绍符号互动论的一章里,也指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一种类似的理论策略。未能解决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中存在的某些基本争议,或许也是社会理论始终处于分裂、歧异和松散之中的一个原因。社会理论往往在遵从时尚与标新立异之间不断摇摆,通过这种循环往复,社会理论家们也不停地重新发明出理论之轮来。*

这种批评性的议论也许显得过分悲观和否定了。我已经指出,在分裂与歧异的总体画面上,也凸现出一些延续、稳定和积累的例证。维特库斯指出,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丰富而富于生机的社会学分析传统。在这里,你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就是声势浩大的对于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及其复兴,这是战后社会理论的标志。对韦伯社会学研究兴趣的复兴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新教伦理命题的典型描述,把韦伯式研究思路拓展到人格、生活秩序与社会世界的概念,经济社会学与分层,国家社会学,比较宗教社会学,以及更晚近时以一种具有强烈的韦伯色彩的研究兴趣,关注晚期资本主义中国家与权力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又不同意吉登斯,他倾向于把韦伯对社会学的贡献否定为已经过时、老套了,因为韦伯据说是把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而在我看来,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Giddens, 1990)里勾勒的对于经典社会学的种种批评,都不该落到韦伯的头上。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意义,韦伯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而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看法之犹疑与含糊,也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一些后现代化的大多数争论 (Turner, 1992)。

5. 社会理论的前景

本序言中对社会理论的讨论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社会理论只有在紧密参与

* 轮子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后的无数技术发明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谚中所谓重新发明出轮子,意谓忽视前人既有技术积累,从头开始,进行重复劳动。——译者注